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10月31日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收录在《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这篇重要文献阐述了坚定制度自信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科学指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自鸦片战争始，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为了拯救民族危亡，无数仁人志士上下求索，尝试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分权制等各种政治制度模式，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才找到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正确道路。

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同我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实际紧密结合，提出了关于国家制度建设的一系列主张。土地革命时期，在江西中央苏区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的探索。抗战时期，建立以延安为中心、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抗日民主政权，成立边区政府，推行“三三制”原则，为新中国建立人民当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

——读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柳宝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并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大提出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的目标是：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坚强制度保障，为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提供了坚实制度基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多方面显著优势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国之所以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局面，在根本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具有的显著优势密不可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13个方面系统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展现出的多方面显著优势，目的就是推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制度自信，使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之所以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就在于我们党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开拓正确道路、发展科学理论、建设有效制度有机统一起来，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认识，及时把成功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制度成果，使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既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满足人民群众热切期待，又深

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沃土。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有效、管用的好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外，没有任何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创造出我国取得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样的奇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成功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与我国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相契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显示出了越来越强大的治理效能，其优势得到了历史和现实的充分检验。新时代，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具有无比坚实的实践基础、具有无比深厚的文化根基、具有无比强大的战略定力。

把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强大治理效能

站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完善好、发展好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

理体系，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推进制度完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一个动态过程，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国家治理面临许多新任务新要求，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我们要在坚持好、巩固好已经建立起来并经过实践检验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前提下，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继续加强制度创新，加快补齐制度短板，建立健全国家治理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所必备的制度。

加强制度执行。“纵有良法美意，非其人而行之，反成弊政。”制度不是摆设、不是装饰品，制度的生命力在于贯彻执行。要强化制度意识，领导干部应带头维护制度权威，作制度执行的表率，确保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重大工作安排都按照制度要求落到实处，切实防止各自为政、标准不一、宽严失度等问题发生，充分发挥制度指引方向、规范行为、提高效率、维护稳定、防范化解风险的重要作用。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切实提高运用制度干事创业能力，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善于在制度的轨道上推进各项事业，让制度管用见效。

强化制度监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强化制度执行力，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要健全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把制度执行和监督贯穿区域治理、部门治理、行业治理、基层治理、单位治理的全过程，树立尊崇制度、执行制度、维护制度的鲜明导向。坚决杜绝制度执行上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的现象，严肃查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阳奉阴违的行为，确保制度时时生威、处处有效。

“真正的革命者”

——读〔加拿大〕切斯特·朗宁《朗宁回忆录——从义和团到人民共和国》

□ 万晓庆

织起来”。朗宁在中国认识的第一个革命者叫董子佩，经常和他谈论中国革命问题，“有时他还谈到毛泽东组织农民的政策，认为那是发动革命的最健全的方式”，“毛泽东在他的故乡湖南省的活动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组织起了两百万农民”。这些农民运动有力声援了北伐革命。其次是组织工人武装起义，配合北伐战争的军事行动。书中提到，“周恩来已经在上海从内部组织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工人起义，使北伐军的东路军得以进入上海。”再次是对北伐军进行思想教育。在黄埔军校，周恩来在政治部工作，“负责对部队和黄埔士官生进行教育，准备北伐”。在战争中，北洋军阀军事力量强大，吴佩孚以为武汉城壕是“法国式防线”，任何军队也无法攻破。但北伐军继攻克长沙后一举攻占武汉，打破了武汉固若金汤、牢不可破的神话。这里面，共产党对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起了重要作用，朗宁提到：“我有个学生参加过北伐战争。其中一个向我谈起，他们的部队在黄埔军校受到周恩来和他的助手们非常良好的教育。”

高举抗日救亡旗帜

北伐战争即将结束时，朗宁返回加拿大，但他依然密切关注着中国革命。他关注南京国民政府组建、红军长征、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关注抗日战争时中国的形势变化。面对侵华日军，国共两党的选择天壤之别。蒋介石“选择了使用武力摧毁共产党的道路，而且似乎在轻率地考虑着最终与日本人妥协”。“蒋介石最热衷的仍然是内战的胜利。”而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瑞金政府所作的第一个国际决定，就是对日本宣战。这一决定受

到全国人民的热烈的拥护，激起了民族仇恨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自发浪潮。”朗宁认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决心从没有动摇过。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异常复杂。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放下长达十年的恩怨，力促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周恩来从上海匆匆赶到了西安。他不愿意蒋介石受伤或被杀，实际上他希望的委员长命令国民党部队抗日。”郎宁指出，“在建立把日本赶出中国的统一战线上，周恩来起到了关键作用”。而抗战时的国际援助，包括美国、苏联等大国的援助都给了国民政府，共产党在自身力量还很弱小的情况下，仍独立开辟了大量的敌后根据地，“共产党的军队没有外国人的帮助也在华北从日本人手下解放了广大的地区”。

深受群众拥戴

抗战胜利后，朗宁来到重庆任加拿大驻重庆使馆一等秘书，从那时开始，他就每周写一封信阅信寄给家人，信的内容有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情况。针对当时中国人民关注的反对内战、改组中国政府、军队国家化、美军早日回国等问题，朗宁提出“中国必须出现一个能把建立和平与统一作为解决其他重大问题的基础的政府”。当时，包括外国使节在内的大部分人都把希望寄托在国民政府。加拿大大使奥德朗在一份报告中提出：“如果没有怀着远见和卓识、对中国群众具有伟大无私的爱领袖站出来，中国人就得永远挨饿。”奥德朗也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但几年后他颠覆了自己对蒋介石的评价。不仅是政治人物，就是在华工作的普通外国人，也认识到了国共两党的巨大差别。朗宁写到这样一件事：“有个加拿大医生受到几个加拿大人委托，到共产党解放的某些地区去

检查医院”，“在去之前他对共产党是持批评态度的，但是回来后却拿共产党的办事作风和国民党做了对比，说得热情洋溢”。这位加拿大医生对比了五个方面的差别，“他认为他们比国民党不知道要好了多少，简直很难想象是在同一个国度”。

改变中国社会

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朗宁出任加拿大南京使馆临时代办。这个时期，他以外交人员的身份亲历了新、旧两个政权交替的历史时刻。南京解放时，朗宁与家人一同赶到城门，挤在欢迎解放军入城的群众中，欣喜地目睹了这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威武之师雄赳赳气昂昂进入南京。在书中，他还记录了农民分田分地，彻底摆脱了做牛做马的悲惨境地；河渠得到疏浚，苛捐杂税和高利贷一律被取缔，移风易俗，涤荡了旧社会的一切污泥浊水的情况。朗宁由衷赞叹共产党的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在战争成为最重要的问题的时候，河堤的修建，淤塞的清除，防洪用的排洪渠和防旱用的灌溉渠的修建，全都会被忽略。这一切都随着人民解放军的到来而改变了”。

朗宁曾与许多国内政治人物有过深交深谈，也接触过很多国家的大使、特使，还与中国各种阶层的人打过交道，这使得他在写作时能多视角取材，如书中谈到共产党受到群众拥戴的情形，就写到了来自不同群体的人，甚至还有白崇禧的评价：“共产党在他们现在占领的地区很受拥护。”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风云激荡，许多政治势力在这个历史舞台上闪亮登场，最后又黯然退场。只有中国共产党抱着改变中国积贫积弱面貌的初心，领导人民最终取得革命胜利。朗宁像亿万翻身的中国人一样，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用典释义

常制不可以待变化，一途不可以应万方，刻船不可以索遗剑。

【讲话原文】

勇于自我革命，始终成为紧跟党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组织。对共青团来说，建设什么样的青年组织、怎样建设青年组织是事关根本的重大问题。“常制不可以待变化，一途不可以应万方，刻船不可以索遗剑。”共青团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跟上时代前进、青年发展、实践创新的步伐。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2年5月10日）

【出处】

抱朴子曰：常制不可以待变化，一途不可以应万方，刻船不可以索遗剑，胶柱不可以谐清音。故翠盖不设于晴朗，朱轮不施于涉川，味淡则加之盐，沸溢则增水而减火。

——（东晋）葛洪《抱朴子·外篇·广譬》

【解读】

《抱朴子》是东晋学者葛洪的道家理论著作。该书秉持以道为本的原则，但在社会历史观层面上，又提出了“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时移世改，理自然也”等观点。葛洪的变化观与原始道家因顺自然、无为而治的思想迥异，体现了对儒家入世思想的继承与借鉴。

在《抱朴子·外篇·广譬》中，葛洪提出：“常制不可以待变化，一途不可以应万方，刻船不可以索遗剑。”涂，通“途”，道路。意思是，固定不变的制度不能应对千变万化的社会，一条道路不可以通达无数的目的地，在行船上刻记号无法找到落入水中的宝剑。其中提到了《吕氏春秋》中“刻舟求剑”的故事。

葛洪的变化观源于其“物性可变”的哲学观。在长期的从医实践中，葛洪接触到大量物质变化现象：“铅性白也，而赤之以为

丹。丹性赤也，而白之而为铅。云雨雪霜，皆天地之气也，而以药作之，与真无异也。……至于高山为渊，深谷为陵，此亦大物之变化。”物质的变化现象使葛洪得出了“事物可变”的正确结论。葛洪的变化观，既讲“法自然”，又讲“非自然”。“法自然”就是顺应自然，不违背自然规律；“非自然”就是在自然法则之外施人道、尽人事。

5月10日，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勇于自我革命，始终成为紧跟党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组织。对共青团来说，建设什么样的青年组织、怎样建设青年组织是事关根本的重大问题。”他要求新时代共青团勇于自我革命，跟上时代前进、青年发展、实践创新的步伐。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作坚决斗争，不断应对好自身在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风险考验，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自诞生之日起，始终以党的政治纲领为奋斗目标，以党的指导思想为行动指南，以党的中心任务为神圣使命。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共青团要自觉对标全面从严治党的经验做法，以改革创新精神和从严从实之风加强自身建设，严于管团治团，在全方位、高标准锻造中焕发出共青团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

（杨立新）



切斯特·朗宁一生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先后四次来中国生活、学习、工作，“每个阶段都恰好对应着革命发展的一个紧要关头”。1970年，朗宁所著《革命中的中国回忆录——从义和团到人民共和国》出版发行，在西方引起轰动。该书曾在中国原文出版，后又译为中文版，书名改为《朗宁回忆录——从义和团到人民共和国》。在书中，朗宁聚焦中国近现代中国社会革命，他认为“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要“让读者能更正确地理解今天的中国人民和这场正创造着一个新的中国的深刻革命变化”。朗宁称赞这场“新的中国的深刻革命变化”是由中国共产党的胜利革命带来的，称赞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革命者”。

大革命的生力军

朗宁认为，国民大革命的爆发有历史必然性，“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在中国实行议会民主终于失去了信心，开始考虑使用别的办法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而要进行这类改革又非先取得政权不可”。大革命以国民党为主导，但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成为中国社会变革大潮中的生力军，“孙中山博士希望通过邀请中国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把中国的全体革命者联合起来”。朗宁提到，在唤起千百万工农的大革命中，年轻的共产党起了重要作用。首先是“把没有文化和知识的农民组